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丛书

# 中國現代文學史摘要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史指要

钱 谷 融 主编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阜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40千字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9,000本

---

ISBN 7—5617—0072—5/I·004

定价: 1.45元

---

## 目 录

|                      |         |
|----------------------|---------|
|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 ( 1 )   |
| “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    | ( 12 )  |
|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左翼作家联盟····· | ( 18 )  |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 27 )  |
| 鲁迅·····              | ( 36 )  |
| 《阿Q正传》·····          | ( 45 )  |
| 鲁迅的杂文·····           | ( 50 )  |
| 文学研究会·····           | ( 60 )  |
| 创造社·····             | ( 69 )  |
| 郭沫若·····             | ( 77 )  |
| 《女神》·····            | ( 86 )  |
| 郁达夫·····             | ( 93 )  |
| 语丝社·····             | ( 100 ) |
| 新月诗派·····            | ( 108 ) |
| 茅盾·····              | ( 118 ) |
| 《子夜》·····            | ( 127 ) |
| 巴金·····              | ( 134 ) |
| 《家》·····             | ( 144 ) |
| 老舍·····              | ( 149 ) |
| 《骆驼祥子》·····          | ( 156 ) |
| 曹禺·····              | ( 162 ) |
| 《雷雨》·····            | ( 167 ) |
| 沈从文·····             | ( 173 ) |
| 艾青·····              | ( 182 ) |

|                   |         |
|-------------------|---------|
| 丁玲.....           | ( 191 ) |
| 张天翼.....          | ( 198 ) |
| 沙汀.....           | ( 204 ) |
| 艾芜.....           | ( 211 ) |
| 现代话剧创作.....       | ( 217 ) |
| 三十年代的现实主义诗歌.....  | ( 227 ) |
| 戴望舒与现代派.....      | ( 235 ) |
| 胡风和“七月派”诗歌.....   | ( 242 ) |
| 赵树理.....          | ( 254 ) |
| 孙犁.....           | ( 261 ) |
| 《暴风骤雨》.....       | ( 267 ) |
| 附 现代文学常用名词解释..... | ( 273 ) |

#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 一、“文学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和主要内容

“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它发生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夕，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的。

### 近代进步文学的先导作用

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进步作家就昌言“经世致用之学”，他们的创作已开始显示了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这是晚清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的先声。1895年戊戌变法前后，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达到了高潮：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首倡“诗界革命”，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和“新文体”，连桐城派的“新秀”严复、林纾也看到了古文的没落，转而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科学、哲学、文学名著，为近代进步文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与此同时，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的开展也显示了以白话代替文言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趋势。梁启超的以“平易畅达”“条理明晰”见称的“新民体”散文（以其掲載于《新民丛报》而争名）、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的诗歌创作主张及其代表作《人境庐诗草》、裘廷梁的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乃至章士钊的政论及《双秤记》等小说……在当时都发生了很大影响。近代进步文学虽然缺乏彻底破旧立新的

革命精神因而没能明确举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大旗（这固然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所致），但它在内容和形式各方面都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向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变。

### 域外文学的催生作用

早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就开始有对欧美资产阶级文学的翻译介绍。严复、林纾、苏曼殊、包天笑、伍光建、周瘦鹃等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仅林纾在1899——1919年间翻译的西洋小说就达171部（297册）之多。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更以空前的规模、广阔的视野开展对欧洲各国、美、俄、日、印等重要文学作品的较为系统的翻译。他们以《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为阵地，一方面在理论上倡扬西欧近代文学、人道主义文学、写实主义文学……的优长，认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创建离不开对西洋文学的借鉴、学习，要以它为“楷模”、“范本”、“榜样”，另一方面，他们组成了强大壮观的翻译队伍，亲身实践自己提出的理论主张。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耿济之、瞿秋白等都是活跃的翻译家。其中，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更是中国文学家的“目标”，正如瞿秋白所分析的，“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这主要是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探讨“中国走什么道路”时所表现出的从欧美转向苏俄的一个方面。“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东西方文化的撞击，是世界文学史上所罕见的。

### 国内外形势的激发作用

1911年满清帝室的倾覆、中华民国的成立，与前此废除科举的变革、政体的变革、民主政治代替了君主帝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一重大转折。1917年在我国的北邻——俄国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次年，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我国。新思潮的侵入与欧风美雨结合，有力地冲击着千年古国和我国

国民的心理，酝酿中的文化改革因此带上思想启蒙运动的强烈色彩。1919年5月4日发生的爱国反帝的学生运动，全国人民反帝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新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随之也要求新的文化、新的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运动。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五四”文学革命，也便适应当时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的要求，适应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要求而兴起了，实乃势所必至、理所当然。

“五四”文学革命从酝酿到正式提出到蓬勃发展，有一个过程。

酝酿阶段(1915—1916)——新文化运动的“发难者”是《新青年》。《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编者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创建新文化的“自由”、“进步”、“进取”、“世界”、“实利”、“科学”等六点希望，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继而他又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力倡“写实主义”。1916年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致函陈独秀，起而呼应，并提出“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之中，关于“形式上之革命”者有五：“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关于“精神上之革命”者有三：“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这段时期还是少数人酝酿商讨的阶段。

倡导阶段(1917年初—1918年初)——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是使“文学革命”从少数人的酝酿发展为正式兴起运动的一个标志。《刍议》系统阐述了前述之“八事”，虽避“革命”而言“改良”，缺乏战斗气概和彻底革命的精神，但基本上揭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要求，而获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赞助。

文学革命的正式宣言是陈独秀1917年2月发表的《文学革命

论》，公开“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提出了反对封建旧文学、建立民主主义新文学的战斗口号和“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与之相对，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胡适和陈独秀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刘半农与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演出了一场“双簧”，借以猛烈抨击“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阐扬文学革命的见解。刘半农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钱玄同致陈独秀、胡适的一系列公开信，都表示了对文学革命的极大热情，并提出了书写格式由右行直下改为左行横迤、文章分段、用新式标点等不少具体倡议。

这一阶段的倡导，还主要围绕着文学形式的改革，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发展阶段（1918年上半年—1921年上半年）——1918年初《新青年》编辑部改组，李大钊、鲁迅参加了编辑工作。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改“八事”为“八不主义”，并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十个大字为建设新文学的宗旨。如果说胡适的文学观念还仅从文学形式的变革着眼，鲁迅的《渡河与引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则进一步提出了文学的思想内容的革命问题。鲁迅认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周作人也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这期间，《狂人日记》（鲁迅）、《尝试集》（胡适）、《女神》（郭沫若）、《终身大事》（胡适）等作品相继问世，奉献了现代小说、诗歌、剧本创作的最早的果实；1921年，众多的文学社团的蠡起，都标志着文学革命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有：

（一）反对封建旧文学，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学。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最初树起的两面大旗，就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陈独秀在回击封建守旧派诬蔑攻击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鲜明地提出了“民主”（当时称“德先生”，即Democracy，德莫克拉西）和“科学”（当时称“赛先生”，即Science，赛因斯）两个口号，概括了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他提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所提出的“三大主义”更表现出大胆否定封建旧文学的激进姿态。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并且都众口一词地反对“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及文学作封建统治阶级“阐道翼教”的工具这些传统的封建文学观。钱玄同、刘半农等积极撰文痛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也提出了打倒“非人的文学”的见解。在对旧文学的批判中，倡导者们显示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

在抨击批判封建旧文学的同时，倡导者们也从正面提出了建树新文学的可贵见解，积极宣传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观。胡适的八事（及后来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李大钊提出新文学必须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都为新文学的建立从理论上开辟了道路。

在创作方面，《新青年》在1918年1月号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九首白话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白话新诗作品，嗣后不久，胡适即率先出版了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鲁迅在1918年5月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不仅猛烈地抨击了几千年来“吃人”的封建制度，表现了中国

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主题，而且以其“格式的特别、表现的深切”和冷峻的现实主义力量，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学旗手的历史地位。继后出现的《新潮》小说家（如杨振声、俞平伯、罗家伦、叶绍钧等）也贡献了富有时代新气息的作品。郭沫若1921年出版了诗集《女神》，更以其大胆的叛逆精神和狂飙突进的气势，开一代诗风。旧剧的改革与西洋话剧的引进，成了一时的风尚。许多新文学作品那种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倾向和民主主义思想，使它们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

## （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破旧立新的文学革命不可能离开文学语言形式的革新。提倡科学与民主，势必要求用新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新的思想。中国传统的文言文，虽然在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上也有它光荣的过去，起过历史的作用，但它充满了封建意识、脱离广大人民的语言实际，早已成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最初也正是从语言形式上打开缺口，倡言革新的。他们不再象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那样主张白话和文言并用，而毅然提出白话为文学之正宗，新鲜的白话应取僵死的文言而代之。在他们的鼓吹下，提倡白话文俨然形成了更具广泛意义的全国性的白话文运动。1918年1月《新青年》一马当先，全部改用白话；1919年下半年起，白话文刊物竞相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白话文刊物多达四百余种。一些颇有影响的老刊物如《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也迫于形势，改用白话。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全国小学一二年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开始使用白话的语文教材，这意味着承认白话为“国语”。围绕着使用白话还是使用文言的斗争（“文白之争”）是文学革命倡导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胡适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并为此写过一部《白话文学史》，鼓吹以二十世纪之“活字”写作，以成“但丁、路德之伟业”。林纾则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登大雅之堂。

蔡元培公开复信林纾，驳斥他在《致蔡鹤卿书》中所发出的无稽攻击。白话国语逐步得到推广，白话文也终于取代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白话文的胜利，自然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胜利。

### （三）外国文学的大量翻译介绍。

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撰写了长篇论文《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介绍欧洲文艺的发展潮流。《新青年》从创刊号起，在刊载白话创作的同时，就把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置于重要地位。1918年它出版了“易卜生专号”，译载了易卜生的传略和易著剧作《娜拉》、《国民公敌》，引起了强烈反响。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认识到吸取异域营养，是发展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条件，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瞿秋白、沈雁冰、郑振铎、田汉、耿济之等都比较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翻译介绍了欧美各国（特别是东南欧和北欧的弱小民族以及俄国）、亚洲的日本、印度的文学名著，屠格涅夫、莫泊桑、都德、泰戈尔、契诃夫、王尔德、龚古尔兄弟、显克微支、高尔基……等各个国家、各种倾向的作家作品几乎同时被介绍进来。胡适作《易卜生主义》、周作人介绍《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愈之发表《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雁冰提出《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文学么》、昔尘介绍《现代文学上的新浪漫主义》、震瀛谈《文艺和布尔塞维克》……这些论文表现了倡导者们对国外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潮、创作流派都很热心都欲介绍引进，显示了他们视野和胸襟的开阔，不仅要通过作品的翻译，而且要借重于各种文学思潮的引进，推动中国文坛文学观念的变革，鲜明地表达了倡导者们决心沟通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这一愿望，这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无疑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

外国文学作品、思潮的介绍，直接影响了现代作家的创作。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们自述他们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正是由于受到了外国作家和作品的积极影响，如果戈理之于鲁迅、惠特曼之于郭沫若、欧文、华盛顿之于叶绍钧、泰戈尔之于冰心……许

多作家对各国文学中纷纭繁杂的各种创作方法、思潮、流派，不仅有所了解，而且有实践。这就比晚清的翻译家们更胜一筹了。总之，“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可称一时之盛，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于中国新文学冲破封建文学的桎梏，实现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 二、对封建复古派的斗争

文学革命从倡导到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充满了与封建复古派的斗争。计其大者有三：

一是1919年与“国粹派”（林纾、刘师培、黄侃等）的斗争。

随着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日益扩大，反动封建势力由视若无睹、不屑置辩转为恐惧、仇视并起而诅咒、恫吓、禁压。早在1917年1、2月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刚刚发表，桐城派封建文人林纾就撰文（《论古文之不当废》）攻击文学革命，1919年2、3月间，林纾又连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影射新文化运动、攻击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支持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以及蔡元培等，甚至妄想请出“伟丈夫”荆生（指北洋军阀徐树铮）来加以弹压。接着又刊出《致蔡鹤卿太史书》、《再答鹤卿书》（鹤卿是蔡元培的字），大骂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倡导者是“人头畜鸣”，公然声称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这场斗争史称“林蔡之争”。

配合林纾的攻击，北大教授刘师培、黄侃成立国故社，并在三月创办《国故》月刊，声言“振颓纲以绍前载，鼓芳风以扇游尘”，“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与此同时，北大校内传出陈、胡、刘或被“驱逐出校”、或“自行辞职”的流言，混淆视听，居心叵测。

新文学阵营对“国粹派”的进攻和攻击，给予了猛烈反击。早在1919年初，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刊于《新青年》第6卷第1号）就义正辞严地回击了封建阶级对于《新青

年》的种种非难，以大无畏的气概宣称，若因为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面对林纾的进攻，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纷纷著文，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林纾等人的澜言，并警告这些阻挡时代潮流的顽固派“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那伟丈夫的摧残”。“国粹派”在进步舆论的致命打击下最终失败了。

二是与复古主义的“学衡派”（胡先骕、梅光迪、吴宓）和“甲寅派”（章士钊为首）的斗争

“五四”运动以后，军阀政府加紧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压迫，文化界也出现了一股复古主义逆流，继桐城派、“文选”派之后，又发动了一场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反攻。构成这股逆流的有两方面的人物，一为南方的“学衡”派，一为北方的“甲寅派”。

“学衡”派以出版《学衡》杂志得名。主要人物是南京东南大学的教师胡先骕、梅光迪、吴宓，他们都曾留学欧美，标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旗号。1922年顷，胡、梅、吴等人陆续著文，反对文学革命，仇视学生运动，反对语文合一，诬蔑白话诗“仅为白话而非诗”，鼓吹文言胜于白话，千方百计地维护僵死的封建文学。他们的文章主要有《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评〈尝试集〉》（胡先骕）、《论新文化运动》（吴宓）等。

“甲寅派”以出版《甲寅》周刊得名。主要人物是当时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1925年，他复刊《甲寅》以为阵地，攻击诋毁学生运动，鼓吹“读经”，提倡文言，反对白话，为军阀政府辩护，攻击新文化运动是“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章士钊在《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中，大肆鼓吹复古主义。

胡、梅、吴、章等人的倒行逆施，遭到了新文化战线的严正

揭露和深刻批判。鲁迅、邓中夏等及时揭露了“学衡派”的反动本质，指出他们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是一丘之貉，是“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沈雁冰、郑振铎在《评梅光迪之所评》、《新与旧》等文中也抨击了“学衡派”。鲁迅一针见血地把《甲寅》称为“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在《评文心雕龙》、《十四年的“读经”》、《答KS君》等文中，无情揭露了章士钊“读经救国”论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成仿吾的《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号〈评新文化运动〉》、沈雁冰的《驳反对白话诗者》亦驳斥了章氏的谬说。在进步文化思想界的批判声中，“学衡”派、“甲寅”派也狼狈败退了。

三是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

“鸳鸯蝴蝶派”产生于清末民初，而极盛于“五四”前夕。因其绝大多数作品所写不外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这类“新的才子+佳人”而得名（又由于所办的最老刊物名《礼拜六》而被称为“礼拜六”派）。文学革命兴起后一度遭到打击。“五四”潮落以后，却又在复古逆流中沉渣泛起。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不断地展开了对它们的批判，尤以文学研究会同人斗争最力。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都写了文章批判其“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以及艺术手法上的“记帐式”和“虚伪做作”。创造社的成仿吾也著文抨击“鸳蝴派”是“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奇耻。”新文学阵营的批判使“鸳蝴”派有所收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它的分化。

新文学阵营与封建守旧派、复古派的这几次斗争，促进了文学革命的深入，保卫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刚刚诞生的新文学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 三、文学革命运动的成就和不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具有伟大

的历史意义，主要是：

（一）它与整个新文化运动一起，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文学所开展的彻底的、不妥协的批判和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它与整个新文化运动一起，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了舆论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从此，新文学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翼，一直伴随着革命向前深入和发展。

（三）它冲破了旧文学和文言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双重桎梏，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文学的统治地位，初步建立了以彻底反帝反封建为特质的新文学，宣告了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和现代文学的诞生。作为一种历史的转折，它以百花齐放的文学创作、实力雄厚的创作队伍、进步新颖的文学观念，开创了一个文学的新纪元，为实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大众化，开辟了道路。

（四）它促进了中外文学的交流和冲撞，使反帝反封建的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进步潮流的重要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坚实基础，具有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

“五四”文学革命也有它的局限：（一）由于思想方法方面的原因，对待具体事物缺少历史的批判精神。（二）由于历史条件方面的原因，未能（也不可能）使新文学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

（曹惠民执笔）

## “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

### 一、早期共产党人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文学领域内，便出现了革命文学的酝酿和倡导。1923年至1926年间，一些从事宣传工作和青年运动的党员如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肖楚女、沈雁冰等，率先在《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周刊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宣传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主张。其内容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他们针对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观，如所谓“艺术创造一切”、“摆脱一切的艺术才是真艺术”之类的说法，明确肯定了文学的上层建筑性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曾发表《新宣言》，指出“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认为中国革命运动和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萧楚女则在《艺术与生活》一文中正确地解释了文艺的本质：“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艺术不过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底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所以它不可能“创造一切”，“摆脱一切”。

其次，他们主张文艺应为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服务。当时，“不问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在文艺青年中颇为严重，邓中夏因

而写《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指出文学乃“惊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的一种“最有效用的工具”；劝告作家务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沈雁冰在《文学者的新使命》等文中也说：“文学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抓住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用深刻伟大的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并且感召起更伟大更热烈的革命运动来！”

再次，他们要求作家深入生活，“到民间去”，“从事革命的实际生活”。恽代英在《中国所要的文学家》一文按语中写道：

“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感情。”又说：“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文学与革命》）这就正确地阐明了产生革命文学的途径：深入斗争生活，接近劳苦大众。

当然，早期共产党人的这些主张并不是完整系统的，更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着过多否定当时文坛和过分轻视文艺特征的“左”的偏颇），但其影响都不可低估。它不仅培养了一批专事提倡革命或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文学社团，并在“五卅”以后促使一大批小资产阶级作家在政治上和文艺思想上趋向革命化，从而为后来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开展和革命文学的创作准备了条件。

## 二、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倡导

1928年1月，创造社和太阳社正式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出并阐述了“革命文学”的口号。这是“五四”以来文化革命的深入，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质的飞跃——由文学革命运动发展到革命文学运动。

这个口号为什么偏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才正式提出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是形势的要求，大革命惨遭失败后，阶级关系发生急剧变